



苗学研究

(三)

贵州苗学
李德平 主编



贵州人民出版社

苗学研究(三)

贵州苗学会 编

李锦平 主编

贵州人民出版社

(黔)新登字01号

责任编辑 士 心

封面设计 张 彪

苗 学 研 究 (三)

李锦平 主编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中华北路289号)

贵阳黔春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32 7.5印张 150千字

1994年12月第1版 1994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

ISBN7-221-03693-4/Z·79 定价: 5.60元

本论文集受以下各位日本朋友
资助，特此致谢！

东京都立大学
新泻大学
神户大学
丽泽大学
民俗摄影家
京都产业大学
迹见女子大学
学习院大学
法政大学
筑波大学

饭仓照平
福田亚细男
谷口裕久
金丸良子
萩原秀三郎
矢放昭文
田畑久夫
武内房司
曾士才
佐野贤治

目 录

苗族研究的新进展·····	李廷贵 (1)
试论苗学研究的方法论原则·····	石朝江 (11)
“熟苗”论·····	吴荣臻 (19)
李鸿基籍贯考	
——兼与吴正煦同志商榷·····	王秀盈 (35)
论苗族开发川东南的贡献·····	蔡盛炽 (51)
试论盘瓠氏族与地名相关的源流·····	石元生 (68)
黔南苗族支系的分布·····	吴正彪 (76)
再论贵州苗族地区经济“生长点”的形成	
·····	黄保勤 (81)
试论苗族的生存空间·····	袁定基 刘德昌 (96)
关于振兴苗族的几点思考·····	潘正才 (114)
昭通地区苗族脱贫的探讨·····	熊明海 (122)
苗族文化生态研究·····	潘定智 (138)
古驿苗寨话“烧灵”·····	刘 锋 (150)

黔东南苗族的信仰崇拜.....李锦平 (170)

歇山活化石

——黔东南苗族民居建筑浅析.....彭礼福 (176)

浅析川南珙县苗族竹文化.....陶小平 (184)

黔东南民族节日饮食特点初探.....吴翠蓉 (193)

西江苗语与规范苗语语音的初步比较.....李锦平 (199)

苗族地名的文化内涵发微.....宋 元 (243)

住地域等，属于“记录民族学”或“方志民族学”的范畴。

民国时期，开始有对苗族的专题调查，有对苗族历史文化的研究，重点在苗族族源、人种、服饰、婚姻、宗教等方面，可视之为“文化人类学”或“苗族民俗学”的范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对苗族的调查与研究有了拓展，举凡经济、政治、历史、文化、宗教信仰、民风民俗、社会组织、语言文字以及支系姓氏等都有涉猎，有谓之“全方位研究”的，有谓之“系统化研究”的，可归纳为“理论民族学”或“苗学系统论”的范畴。

一、辛亥革命以前有关苗族的资料

自文明社会以来到封建帝制灭亡，凡几千年。历史文献出现的有关苗族资料不少。但均为记录性质，谈不上研究，所以我称之为“记录民族学”或“方志民族学”。如《国语》、《战国策》、《龙鱼河图》、《金文丛考》、《商君书》、《山海经》、《尚书》、《周书》、《墨子》、《诗经》、《荀子》、《韩非子》、《礼记》、《帝王世纪》、《竹书纪年》、《左传》、《吕氏春秋》、《淮南子》、《文献通考》、《楚辞》、《汉书》、《后汉书》、《路史》、《太平御览》、《史记》、《神异经》、《隋书》、《晋书》、《新唐书》、《朝野僉载》（张鷟）、《通典》、《太平寰宇记》、《旧五代史》、《十国春秋》、《宋史》、《宋书》、《记三苗》（朱熹）、《溪蛮丛笑》（朱辅）、《三国志》、《桂海虞衡志》（范成大）、《华阳国志》、《蛮书》（樊绰）、《南史》、《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水经注》（酈道元）、《魏书》、《北史》、《新

五代史》、《宋会要辑稿》、《酉阳直隶州总志》、《酉阳冉氏宗谱》、《容斋四笔》（洪迈）、《兰氏墨谱》、《元和郡县志》、《巴志》（谯周）、《宋学士文集》（宋濂）、《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续资治通鉴长编》、《宝庆府志》、《老学庵笔记》（陆游）、《贵州通志》、《炎徽纪闻》、《明史》（张廷玉）、《黔记》（李宗昉）、《黔记》（郭子章）、《改土归流说》（王履阶）、《黔南识略》（爱必达）、《辍耕录》（陶宗仪）、《湖南通志》、《平播全书》、《苗防备览》（严如煜）、《平苗议》（田英彦）、《黔书》（田雯）、《元史》、《万历武功录》、《明实录》、《苗疆纪事》（胡宗绪）、《清实录》、《征苗录》（叶藟）、《外苗近事》（李恺）、《明史纪事本末》、《天下郡国利病书》（顾炎武）、《圣武记》（魏源）、《雍正朝东华录》、《同治东华录》、《黔南职方纪略》（罗绕典）、《征苗图记》（卜大同）、《苗民考》（龚柴）、《峒溪纤志》（陆次云）、《抚苗论》（高登云）、《钦定平苗纪略》、《苗变纪事》（韩超）、《苗俗记》（贝青乔）、《平定苗匪纪略》、《苗疆闻见录》（徐家干）、《苗俗纪闻》（方亨咸）、《黔乱纪实》（刘书年）、《金壶七墨》（董金宰）、《说蛮》（檀萃）、《条陈东路可虑情形十五事》（胡林翼）、《咸同贵州军事史》（凌惕安）、《湘军记》（王定安）、《苗疆屯防实录》、《湖南苗防屯政考》（但湘良）、《湘西土司辑略》（谢华）、《苗疆告竣撤兵疏》（张广泗）等等，举不胜举。这众多的书、志和笔记，有记录苗族生活习俗的、也有考证苗族来源的。但主要是“平苗纪略”，从中可以领略苗族被称为“反

抗的民族”的原因。

二、民国时期的苗族研究资料

民国年间对苗族的调查与研究，有三部分人进行：一部分是历史学家和民族学家对苗族历史文献的整理与论述以及对苗族地区的田野调查；一部分是外国传教士和旅行家对苗族人民生活的采访介绍以及传教、信教的报导；一部分是苗族知识分子对本民族历史文化的记述、整理与撰著以及呼吁民族平等、民族自治等文章。这一时期的苗族研究，我称之为“文化人类学”或“苗族民俗学”。

关于历史学家和民族学家对苗族（历史文献的整理和田野调查）研究的情况，比较著名的著作或论文有以下这些：

《古典新义》、《伏羲考》（闻一多）

《湘西苗族调查报告》（凌纯声、芮逸夫）

《贵州苗夷社会研究》（吴泽霖、陈国均等）

《黔滇川旅行记》（薛绍明）

《岭表纪蛮》（刘锡藩）

《湘西乡土调查汇编》（1938年）

《中国通史简编》（范文澜）

《简明中国通史》（吕振羽）

属于外国旅行家、传教士和学者们的著述的有：

《苗族调查报告》（日，鸟居龙藏）

《关于中国的苗子或土著居民》（英，洛克哈特）

《中国西部的苗子和其他部落》（英，克拉克）

《苗族史》和《苗一法词典》（法，萨维那）

《苗族史》（俄，伊茨）

属于苗族学者撰写的著述。有杨汉先的《苗族述略》、梁聚五的《苗族发展史》、石启贵的《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等。梁、石两氏的书虽然是共和国建立之后才正式出版的，但其单篇或论述却是在3、40年代完成的，故列入民国时期的苗族研究。

以上是民国年间关于苗族研究著述之要者。至于论文，贵州省民族研究所编印的《民国年间苗族论文集》（1983年12月印刷），可以窥测该时期苗族研究之一斑。此处从略，而国外的论述也还多，每年平均两部。这里不再一一列举。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苗族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苗族研究有新的发展。专家们认定是“全方位”的研究。无论是广度或深度都是前所未有的。因为这一时期的苗族研究是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进行的，学者们均能运用唯物的、辩证的、历史的观点来调查研究，所以，我把这一时期的苗族研究概括为“理论民族学”或“苗学系统论”。

苗学的理论研究或系统研究又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五十年代组织的大规模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其中对苗族的调查收集了几千万字的资料，已整理出来。由贵州民族出版社以《苗族社会历史调查》书名，分（一）（二）（三）三集出版发行。第二阶段是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编写《苗族简史》和《苗族简志》，这项工作，几经反复。数易其稿，铅印了送审简史简志，又铅印了简史简志合编，最后分为《苗族简史》和“地方志”公开出版发行。与此同时，关于苗族的大量文稿出现在各种杂志上，由胡起

望、李廷贵编辑成《苗族研究论丛》出版（费孝通教授题写书名），深受海内外学者欢迎，第三阶段是“苗学”学科的明确提出与深入研究，苗学研究会正式成立，《苗学研究》大型刊物出版是一个重要标志。

我和胡起望先生在《苗族研究的可喜收获》一文中对共和国成立以来的苗学研究成果概括为八条：

- 1、对苗族族源的研究有了进一步的深入和拓展。
- 2、对苗族社会发展的研究开始触及社会性质及其规律。
- 3、对封建王朝的统治方略和苗族的起义斗争的研究深入一步。
- 4、首次开展了关于苗族社会组织的争论。
- 5、对宗教信仰与哲学社会思想进行了开创性试探。
- 6、对苗族文化和艺术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 7、语言文字的研究工作正东山再起并进入实用阶段。
- 8、民间文学在广集资料的基础上开始了专题评论。

这一时期的论著较多（内部铅印的资料更是难以计数），现就其要者列举如下：《中国史稿》（郭沫若主编）、《中国历史讲稿》（吕振羽）、《中国通史续编》（范文澜）、《苗族简史》（龙伯亚、李廷贵等主编）、《清代苗民起义》（马少侨）、《苗族民歌》（田兵）、《苗族史诗》（马学良、今旦）、《苗族研究论丛》（胡起望、李廷贵）、《苗汉词典》（张永祥、许士仁）、《苗语语法纲要》（王春德）、《苗族民间故事选》、《苗族民间故事集》、《苗族社会历史调查》（一）（二）（三）、《苗学研究》（一）（二）、《乾嘉苗民起义史稿》（吴荣臻）、《中国苗族服

饰》（北京民族文化宫）、《贵州少数民族风情》（刘柯）、《苗族文学史》（田兵、刚仁、苏晓星、施培中）、《贵州节日文化》、《苗族四月八》（李明金）、《苗族起义史诗》（杨正保、潘光华）、《蚩尤的传说》（潘定衡、杨朝文）、《苗族舞蹈与巫文化》（杨昌国）、《苗族婚姻礼词》（张应和、彭荣德）、《节日风情与传说》（李瑞岐）、《中国苗族婚俗》（韦启光、朱文东）、《山地的移民》（澳、格迪斯）、《云贵高原的稻作传统》（日，伊藤清斯）、《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纪行》（日，鸟居龙藏）、《中国古代的各民族》（日，李家正文）、《中国南部少数民族志》（日、铃木正崇）、《贵州民俗志、苗族志》（日，君岛久子）、《中国云贵高原的少数民族》（日，铃木正崇、金丸良子）、《苗族历史》（美，基·毛丁）、《主权与起义——泰国北部的白苗社会》（英，坦布）等等，凡近百种，目前已完稿即将出版的著作，有伍新福的《苗族史》、周光大的《苗族史纲》、黄海的《苗族的银饰艺术》、吴仕忠的《苗族的服装和头饰》、李廷贵的《雷公山上的苗家》等。此外，由李廷贵、岑秀文、石照明、吴大华、韦宗林等主编的《苗族原始宗教研究与资料丛编》、《苗族历史文化教科书》、《苗族习惯法》等书，列为社科八五规划项目，正在编纂之中，近年内将问世。

四、苗学研究正在走向系统化

苗学——一门专门研究苗族的学科已经建立起来，并且成了一门世界性的学科，苗族正在走向世界、世界正在关注苗族。据统计，从1831年到1978年的147年间，国家出版的研究苗族或涉及苗族问题的论著达280余种，平均每年有两部

问世。（请参看《人民日报·海外版》1989年11月21日，石朝江：《苗学：一门世界性学科》）。近年来的有关苗族的出版物仍有上升的趋势。这就提醒我们要问一个“为什么”？澳大利亚民族学家格迪斯这样回答：“世界上有两个苦难深重而又顽强不屈的民族。他们是分布在世界各地的苗族和犹太族。”（查其著作《山地的移民》），格迪斯的话是有道理的，但我们的思考更应该广泛一些，更深刻一些。即除了苦难深重、顽强不屈、分布世界这些特点之外，苗族还有历史悠久、迁徙频繁、吞吐量大、支系众多、崇尚自由、反抗性强、勤劳智慧、热情大方、能歌善舞、文采丰富等特性，必然会引起专家学者和旅游宾客的兴趣。加之民族问题的尖锐和复杂，以及东南亚、阿拉伯、东欧、以色列、老挝、南斯拉夫、苏联等国家和地区的民族矛盾和冲突，也必然要引起各界人物的重视。现在，苗学研究中心似乎正在形成，国内的苗学研究以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中央民族学院、中南民族学院、贵州民族学院、贵州省民族研究所、湖南省社科院历史所、广西民族学院、贵州省苗学研究会等单位为重点，一批学者正在分别地或有组织地进行苗学研究；国外的苗学研究有日本、美国、法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一批专家学者在进行，他们之中有不少人不辞辛劳，远道而来中国，来贵州，既搞田野调查，又作学术交流。国内外的苗学研究可谓成果累累，影响深远。

今后的苗学研究需要进入系统化研究的最新阶段，才能把握全面，才能论据正确，才能解决问题，人类由愚昧而野蛮而文明，而高度文明，这是规律。研究由个别的粗浅的而协同的深刻的，而系统化的。这也是规律。现在，大家正在

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进入“全方位”，不约而同的一致盼望“系统化”，以免重复别人所已进行的研究，事倍功半，而应利用现代信息的方便条件或取长补短，或通力合作，以求事半功倍。可见，系统化研究必须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苗学会成立初期，相继组成了八个学科组开展活动，事实证明这是符合系统论原则的，而且已卓有成效，第三次学术讨论会以后，我们要在八个学科类别的基础上提出各个专题，拟定近期目标和远景规划，逐一实现。

系统化研究的目的，是要更快地出成果，更好地为决策部门服务，为发展苗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服务。要达到这一目的，苗学研究要继续发扬从实际出发，加强田野调查和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要继续坚持以群众为师，贯彻百家争鸣和应用第一的正确做法，反对钻故纸堆或故弄玄虚的学究作为，反对独家经营或唯我正确的专利思想，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多出成果，快出成果，也才有可能谈得上系统化研究。

对苗族的历史研究已经明晰脉络，对苗族的民俗研究，也已名扬四海，当前的关键问题是要“致用”，要解决实际困难。如苗族地区的乡镇企业发展问题，亏损者多，污染尤甚，可否办“强人培训班”给厂长经理们一点“良方”呢；又如苗家子女入学难。文盲多或“不愿读书”的问题，可否办“绣花班”“蜡染班”等职业性教育以吸引儿童们的兴趣呢；又如苗族地区农业生产品种单一产量很低的问题，可否重点投资搞示范“立体型”经营给农民们一点科技致富的感性例子呢，……如果我们的研究仅是“纸上谈兵”或“宏伟战略”，那是不会感动我们这个脚踏实地、注重效益的伟大

民族的。“少讲点战略，多搞点战术”，这是许多专家的意见，有了共同的认识、苗学研究必定会在现有基础上大踏步地前进，即不仅在学术上有长足的进展，而且在应用上有宏大的拓展、研究指导应用，应用促进研究，苗学的繁荣和苗族的振兴将成为可能。

愿苗学繁荣，愿苗族兴旺。

1991年7月10日

草于贵州花溪

试论苗学研究的方法论原则

石朝江

苗学，作为一门学科名称提出来已有好几年了。我在《试谈苗学的对象及其意义》（载《苗学研究》第一集）一文中，对苗学的研究对象进行了界定。在《苗学性质初探》（载《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0年第一期）一文中，进而对苗学的学科性质进行了探索。在这里，我想就苗学研究的方法论原则谈点自己粗浅的认识。

苗学既是一门科学，就必然有其科学的研究方法。苗学的研究方法，从根本上说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苗学研究工作中的应用。具体来讲，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则。

一、文献资料与调查研究相结合的原则

文献资料与调查研究相结合，是开展苗学研究的主要途径。苗学的内容极其丰富，“凡属苗族共同体的一切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都在苗学的视野之内，都属于它的研究内容”^①。但我们的研究毕竟只能是有文字可考的文明时代，因为它距现代民族生活年代近，关系密切、资料丰富，进行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比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都大得多。因此，我们必须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指导思想

想，全面系统地查阅文献资料。由于苗族本身没有文字，有限的文献资料对于苗学研究来说，尤为可贵。蚩尤作为苗族的始祖，苗族作为蚩尤的后代，就是根据史料记载和对苗族民间传说的研究而得出结论的。离开了史料，许多问题就无法弄清。但历史是人记述的，而记述历史的人，由于各种原因，不一定就能客观地反映民族历史的真实面貌。因此，我们在查阅应用文献资料时，既要尊重历史文献的原始可靠性，又要注意到历史编纂者的阶级性和历史局限性。从有关苗族的历史文献来看，大多是统治阶级中的文人墨客记述的，从根本上讲，就存在真实与否的问题。“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在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②这当然不是说所有历史文献都是不真实的，只是说在研究问题时，不能盲目地运用历史文献资料，而要有分析地运用它，注意去伪存真。如发现矛盾，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通过比较鉴别，澄清事实，以严格的逻辑分析判断，把被颠倒的东西再颠倒过来，不要凭“想当然”随便肯定或否定历史文献的内容，更不能从实用主义出发各取所需，哪怕是明显的误说也引以为据。要避免发生以讹传讹、谬种流传。同时，我们在研究古文献中记述的东西与现今民族生活实际的联系时，既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也反对厚古非今，既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

民族学资料告诉我们，要对一个落后民族进行研究，仅靠文献史料是远远不够的，更主要的是要开展调查。实地考察